

单位代码	10476
学 号	1913483040
分 类 号	D922

河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问题研究

专业学位领域：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类别：法律硕士

申 请 人：罗振中

指 导 教 师：李佳勋 教授

二〇二二年三月

A STUDY OF DEATH INSURANCE
PROBLEMS OF MINORS IN OUR COUNTR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aw

By

Luo zhenZhong

Supervisor: Prof. Li JiaXun

March, 2022

摘要

保险金的给付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条件的。在巨额保险金的吸引下，杀害被保险人骗取保险金的案例屡见不鲜。由于精神和智力等方面发育的不成熟，未成年人更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因此，为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防止受益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伤害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保险法必须针对未成年死亡保险设立特别条款加以规制。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核心问题是道德风险的防控，我国《保险法》及 2015 年颁布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都针对道德危险防控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在投保主体、未成年人同意权的行使、精神不健全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和保险人的核保责任等方面还有欠缺，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本文结合我国保险实践，通过比较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建议：第一，适当扩大投保主体的范围，赋予有投保意愿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投保的权利；第二，被保险人的同意权专属，让道德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真正发挥作用；第三，区分正常的未成年人与精神不健全的未成年人，对投保限制进行分类，切实维护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权益。第四，进一步丰富保险人核保的内容并强化其责任，堵塞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漏洞。

关键词： 未成年人，同意权，道德风险，投保主体，死亡保险

ABSTRACT

The payment of the insurance money is conditional on the death of the insured. Under the attraction of huge insurance money, the case of killing insurant to defraud insurance money is common. Due to the immature development of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minor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the object of infringe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and prevent the beneficiaries from harming the life and health of minors driven by interests, the insurance law must set up special provisions for minor death insurance.

The core of the death insurance problem for minors i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oral danger. China's Insurance Law and the Thir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urance Law " promulgated in 2015 have mad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oral dange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insurance subjec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onsent of minors, the unsound protection of min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underwriting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insurance practice of China countr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uvenile death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The scope of the insurance subject shall be appropriately expanded, and the grandparents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who are willing to insure shall be given the right to insure. Second, the insured's consent right is exclusive, let the insured's right of consent play a real role. Third, minor insurance distinguishes normal people and unsound mental patients classified insurance,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nsound mental patients. Fourth, further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insurer's underwriting and strengthen its responsibility, and blocking the loopholes in the juvenile death insurance system.

KEY WORDS:minors, right of consent, moral hazard, insurance subject, death insurance

目 录

摘 要	II
ABSTRACT	III
目 录	V
绪 论	1
第一章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基本概况	3
1.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含义及其制度价值	3
1.1.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含义	3
1.1.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制度价值	4
1.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法益衡量	5
1.2.1 道德风险控制优先	5
1.2.2 保险保障供给兼顾	5
1.3 限制投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理由	6
1.3.1 估算人身价值	6
1.3.2 道德危险的防范	7
第二章 典型立法模式比较分析	9
2.1 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模式	9
2.2 以死亡年龄为界点的限制模式	9
2.3 以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和限于丧葬费用的限制模式	10
2.4 单纯保险金额的限制模式	11
第三章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则与案例分析	13
3.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则	13
3.1.1 《保险法》的规定	13
3.1.2 司法解释的规定	13
3.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相关案例分析	13
第四章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7
4.1 投保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17
4.2 被保险人问题	18
4.2.1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意权行使问题	18
4.2.2 精神状态不健全的被保险人的投保问题	18
4.3 对保险人核保责任缺乏适当的规制	20
第五章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建议	21
5.1 投保主体范围适当扩张	21
5.2 被保险人相关规定的完善	21
5.2.1 被保险人的同意权专属	21
5.2.2 未成年被保险人的分类投保	23
5.3 进一步丰富保险人核保的内容并强化其责任	25
结 论	27
参考文献	29

致 谢	31
独 创 性 声 明	33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33

绪 论

死亡保险是保险合同当中道德危险产生最为严重的领域，加上未成年人预防和抵御风险能力弱的特征，怎么解决道德危险问题是各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建设的中中之中，我们国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学术上有一些研究，但是资料较少且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我国保险法采用父母投保、设定最高保险金额和征求未成年人同意等三种方式来解决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存在的道德危险问题，但是目前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防范道德危险的效果并不好，“杀子骗保”的案例时有发生，说明“亲缘关系”并不当然的可靠。

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我国保险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比较不同模式下防控道德风险的立法规定，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找出防控道德风险与未成年人利益保障的均衡点，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死亡保险制度意见建议，以期完善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同时也为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章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基本概况

1.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含义及其制度价值

1.1.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含义

以保险标的为标准，保险可以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1]。”财产保险：“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2]。”由于保险范围的不同，人身保险可以划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三种。人寿保险把人的生死作为保险对象，在保险责任期内，保险人根据合同约定，以被保险人生存或死亡是否发生作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健康保险是以人的健康为内容，当被保险人疾病发生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的身体遭受意外伤害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保险。死亡保险属于人寿保险，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意外死亡，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责任，向保险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没有意外死亡，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根据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是终身，还是一定时间，死亡保险分为终身保险和定期保险。终身保险的保险期间从保险合同成立到被保险人死亡，当被保险人意外死亡时，保险人需要给付保险金。定期保险有一定的保险期限，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期间内意外死亡，则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规定期间届满前没有意外死亡，则该保险合同结束，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由此可以推出，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是一种人寿保险，保险期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之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另外，我国《民法典》第17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同样也是以18周岁作为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界限。通过各个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3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4款。

家和地区的法律可以看出,18 岁周岁也是他们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界限,然而在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国家比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年龄要低于一些,有 15 周岁的,也有 14 周岁的。

本文仍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中关于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进行界定,主要以下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法律具有统一性,我国《保险法》有关于未成年人规定,但是没有对未成年人的年龄进行界定,但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中有关于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所以未成年死亡保险应当沿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中有关于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第二,理解死亡保险可能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的难度,18 周岁以上的人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明白,更不要说 18 周岁以下的人。因此,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沿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中关于未成年人年龄不满 18 周岁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更具有保护作用。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是指以不满 18 周岁的人生死作为是否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1.1.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制度价值

(1) 减少家庭损失

一方面,现在抚养孩子的教育、医疗、生活等支出不断增加,已经占据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如果未成年子女发生意外死亡,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父母为培养子女在教育、医疗、生活等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非常重视丧葬之礼,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可以为未成年死者风光的丧葬提供保障。因此,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可以起到减少家庭损失的作用。

(2) 抚慰父母精神创伤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还不够完善,“养儿防老”在我国仍是主流思想,虽然我国现在已经放开了二胎的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抚养孩子所需要的教育、医疗、生活等支出越来越高,对于大多数年轻夫妇来说养育一个孩子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生育二胎、三胎了,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独生子女将成为普遍现象。可想而知,对于父母来说,一旦独生子女去世,他们将老无所依,在精神上冲击是巨大的,虽然金钱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缺失,但是可以为他们带去一丝安慰。

(3) 减轻教育机构风险

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教育机构的规定，未成年人在学校期间，学校是负有监护职责。中小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在学校的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也极高，倘若没有保险分散学校的风险，那么学校将面临巨大的赔偿压力。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我国《保险法》解释三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之外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为未成年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当事人主张参照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经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除外。”有了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保障，学校对未成年人在学校期间遭遇意外而面临赔偿压力就大大减轻，其风险自然也就因保险的存在而被分散。

1.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法益衡量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具有特殊性，在法益衡量中，道德风险控制相较于保险保障供给应具有优先地位。需要在保险保障供给和道德风险控制进行利益平衡，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既不能一律禁止，又不能与其他保险完全一样，在制定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时，一定要仔细权衡，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种法益。

1.2.1 道德风险控制优先

法益衡量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法益在基本法的“价值秩序”中优越性更高^[3]。任何保险当中都存在道德危险，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来说，防控道德危险十分重要，道德风险控制不能让步于保险保障供给。因为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发育并不完全，风险识别意识和自己保护自己能力相对较低，更容易受外界的侵扰。由于未成年人无法清楚的自我认知和有效的自我保护，给他们投保死亡保险所产生的道德风险远高于成年人的死亡保险。所以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道德风险控制应处于优先地位。

1.2.2 保险保障供给兼顾

比例原则是法益衡量的第二个应该遵守的原则^[4]。为了保护更为优越的法价值，一定要以其他法益的牺牲为代价时，要做到尽量把侵害其他法益的伤害降到最小。纵然在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方面，道德风险控制在法益衡量时居于优先地位，但是保险保障也不

^[3]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4]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能偏废。在某种程度上，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对于分散风险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满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是有风险识别能力的，相较于不满一定年龄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其所面临的道德风险明显降低，因此，不能因噎废食而完全否定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纵然完全不允许设立不满一定年龄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但是也允许设立满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其次，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是未成年人父母支付丧葬费用的一种保障。特别是对于生活困难家庭来说，丧葬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次，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也是超额医疗费用支付的保障。在导致死亡的疾病治疗中，健康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可能不能满足医疗费用的花费，这时，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就能起到加强保障作用。最后，若只对未成年人伤残赔付保险金，而不对未成年人死亡赔付保险金，则明显违反了“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在法理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1.3 限制投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理由

在保险人承保时，保险人非常关注被保险人年龄，因为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死亡的概率在不断的上升。年龄是道德危险估算和危险系数推算的依据。由于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较低，对他们投保死亡保险道德风险就会很高，为了避免未成年人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在保险法中对投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进行适当的规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具体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3.1 估算人身价值

人身价值是不能依据市场价值来估算的，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损失的数额，因此，不论被保人投保几份保险，只要保险合同中约定情况出现，即使有人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每份合同中的保险人也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起各自的保险责任。但是，在保险实践中，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要有一种估算方式。保险领域有两种统计方式，一是生命价值法。生命价值法是按照创造的经济价值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按照这种计算方法，未成年人没有工作，不能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死亡保险不用保障；二是家庭需求法。这种计算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假设被保险人当下出了事故，然后计算事故发生之后家人生活所需费用总和。虽然两种算法不同的，但是出发点都是根据被保险人死亡对家庭的经济影响。根据上述算法，在不考虑丧葬费的条件下，未成

年人似乎不需要死亡保险，但是现实中未成年死亡保险又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这时候就需要国家保险机构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设定未成年死亡保险的最高值。

1.3.2 道德危险的防范

道德危险是指受益人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事故，致使保险标的受到损害或在保险标的受到损失时不采取减轻损失的有效措施的危险。道德危险的发生，既威胁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又影响保险“分散风险”作用的发挥。保险的作用是改变资金的用途，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并不能使社会财富增加或者减少，而道德危险的发生，却降低了保险调配社会资源的作用，反而成为某些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方法^[5]。

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给付方式具有不对等性，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需要支付的保险金远高于投保人所付保险费^[6]。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发展尚未成熟，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当然能够杜绝道德危险的出现，但未成年人对这种保险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法律之所以允许未成年人死亡保险设立，是因为未成年人及其父母都有这种保险保障的需求，若不允许投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一方面，未成年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父母的经济压力不能得到分担。因此，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和分担其父母的经济压力，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但是，为了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5] 参见骆大朝：《死亡保险合同道德危险问题研究》，2006年5月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6] 参见韩长印、韩永强编著：《保险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41页。

第二章 典型立法模式比较分析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主要的限制模式有四种：“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模式、以死亡年龄为界点的限制模式、以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和限于丧葬费用的限制模式和单纯保险金额的限制模式^[7]。”下面将对这四种限制模式进行论述：

2.1 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模式

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立法模式是最严格的限制方式，从法律层面作出禁止性规定，为未成年人订立的死亡保险合同会因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直接被判定为无效合同。法国、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我国澳门地区是用这种方式来防范道德危险发生的。韩国法律规定，为 15 周岁以下的人订立的死亡保险合同无效^[8]。法国法律规定，禁止对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监护的人以及精神病人订立的人寿保险合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即使征得未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书面同意，这种保险合同也是无效的。我国澳门地区的法律把 14 岁以下之未成年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死亡保险合同设为禁区。这种模式优势是能完全防止道德危险，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未成年人也彻底失去了获得保险保障的机会。

2.2 以死亡年龄为界点的限制模式

这种限制模式法律设定了一个固定的年龄，被保险人的死亡时间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死亡保险合同，在达到法律设定的固定年龄之前是无效力的，达到法律设定的固定年龄之后，该保险合同才有效力。这种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相当于是一种附期限的合同，法律设定的固定年龄达到之前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法律是不认可的，如果达到法律设定的固定年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生效，否则不生效。

^[7] 参见梁鹏：《评论与反思——发现保险法的精神》，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83 页。

^[8] 参见胡滨、曹顺明：“未成年人死亡险亟待法规完善”，载《中国保险报》2004 年 8 月 24 日第 2 版。

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了以死亡年龄为界点的限制模式。台湾地区法律把 15 岁作为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生效的界限，被保险人达到 15 岁之后，死亡保险开始生效，被保险人没有达到 15 岁就死亡了，保险人需要退还保险费和保险费在此期间产生的利息^[9]。

此种模式如此限制原因是，死亡保险的对象是人的生命，年龄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智力及保护自身生命安全能力的强弱。在一定年龄之下，未成年人发育受限，更容易遭到外界的伤害，为预防道德危险的发生，把法律设定的固定年龄以下的死亡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未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时，识别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道德危险发生的风险相对减弱，这时候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就能够充分发挥其调配社会资源分配和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作用。

相比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模式，此种模式有所进步，让达到法律设定固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有获得死亡保险保障的机会，但是对于没有达到法律设定固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也有获得保险保障的需求，忽视他们的需求，显然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悖的。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限制模式年龄设定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对特定年龄纪设定偏大或者偏小将直接影响发生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和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的保障程度。

2.3 以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和限于丧葬费用的限制模式

这种限制方式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征求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二是保险金有最高限额，不能超过被保险人死亡时需要的丧葬费用。德国就是采用以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和限于丧葬费用的限制模式^[10]。德国旧保险契约法规定，为他人投保死亡保险时，需要征求他人的书面同意，否则该保险合同无效，并且对死亡保险的保险金设定了最高额即不能超过丧葬所需要的费用，但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为其子女投保死亡保险的，保险金不受丧葬费的限制，但要必须征得子女的同意。德国新保险契约法相较于旧保险契约法有所突破，即父母不用征得 7 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同意，也能为他们投保死亡保险。德国新保险契约法这样规定的依据是，他们认为父母养育子女 7 年之后感情变得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丧葬费用相对来说数额并不大，引发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减少。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德国采用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和保险金限于丧葬费用两种

^[9]梁鹏：《探究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制度》，载《中国保险报》2011 年 3 月 28 日第 5 版。

^[10]毛向东：“死亡保险的道德危险及其法律规制”，载《中国保险报》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方式来防范道德危险。

依据德国《保险契约法》的规定，父母为没有达到 7 岁的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保险时，如果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超过丧葬费，就需要被保险人的同意。显而易见，不满 7 岁的未成年人各个方面都没有发育完全，对死亡保险更是没有理解和同意的能力，德国《保险契约法》为什么这样规定？德国有监护法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监护法院可以充分保障没有达到 7 岁的未成年人同意权的行使，但是我国没有这样部门，通过同意权来防范道德危险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显然易见，德国这种模式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

2.4 单纯保险金额的限制模式

这种限定方法由国家法律设定出最高保险金限额，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最高额不可以超过法律的规定，如若超过，则超过的数额没有法律效力。美国纽约州采用了单纯保险金额的限制模式^[11]。纽约州法律把 14 岁 6 个月作为区分的界限，超过 14 岁 6 个月的未成年保险金额不受限制，未超过 14 岁 6 个月的按照年龄段不同分四个档次划分保险金最高额，随着年龄的增加，保险金额也跟着增加，最低为 1000 美元，最高为 5000 美元。之所以纽约州法律把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保险金最高额设定为 5000 美元，是因为对于美国纽约州大多数家庭来说，5000 美元不会诱使父母杀害子女，因此，能够较好的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对于保险金额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则是基于年龄越大的孩子自我保护能力越强，因此年龄大的孩子保险金额高，年龄小的保险金额低。单纯以保险金额限制模式的好坏关键是保险金限额的设定是否合适，想要把保险金限额设定在既能实现保险保障需求，又能防范道德危险发生，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经济发展迅速和各地区差异的国家，设定一个保险金限额更是困难。

^[11]杜颖：“保险中的道德危险及其消解”，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 年第 4 期。

第三章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则 与案例分析

3.1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则

3.1.1 《保险法》的规定

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集中在我国《保险法》第33条^[12]和第34条^[13]，主要内容：一是除父母之外任何人不得为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二是父母可以为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但是保险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最高额；三是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保险合同也是有效的。即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主要采用父母投保、设定最高保险金额和征求未成年人同意等三种方式来解决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存在的道德危险问题。

3.1.2 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我国《保险法》问题的解释也有涉及，主要内容：一是其他具有监护责任的人在未成年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投保死亡保险；二是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其他具有监护责任的人不用征求他们的子女同意保险合同也是有效的。

3.2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相关案例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在道德危险的防范上具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由于在理念和立法技术的问题，使得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将结合案例分析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在实践中的遇到的问题。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

【案例 1】2018 年 3 月王某的儿子王某甲和王某甲赵某因车祸死亡，王某儿子和儿媳死亡时，孙子王某乙只有二岁，后王某乙一直由王某抚养。2020 年 3 月，王某为王某乙投保了少儿平安险，受益人为王某。2020 年 5 月，王某乙因病死亡。王某遂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但保险公司认为王某为王某乙投保时他只有 4 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为王某乙投保少儿平安险是无效的，因此拒绝赔偿，双方遂引发争议^[14]。

上述案例中王某乙父母因交通事故去世后，生活由爷爷王某照料，实际上此时王某与孙子王某乙双方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但是，王某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说王某为王某乙人投保少儿平安险是无效呢？原因是：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除父母外任何人不得为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因此，王某是王某乙的爷爷，虽然事实上双方具有抚养关系，具备保险利益关系，但是，王某乙死亡时才 5 岁，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其父母可以为其投保死亡保险，作为爷爷王某为王某乙投保少儿平安险是无效的。

【案例 2】2016 年 8 月 12 日，山东某县交警接到李某报警称：其 10 岁的儿子李某甲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慎跌落死亡，但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迹象。另外，交警感觉李某甲父亲李某所说的事故发生过程也是漏洞百出。更加反常的是，李某好像并没因为儿子死亡而悲伤。交警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很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然后把案件移交了刑侦部门，刑侦部门在围绕事故现场周围进行搜索后发现几处被人用土掩埋过的血迹，查明了“交通事故”的真相。最终，李某供述称：其怀疑自己的儿子李某甲是其妻子和别人偷情所生，另一方面自己在外也有一个情人，平时花费比较大，所以就为其儿子李某甲购买了多份以死亡为给付内容的人身保险，然后将通过制造事故杀死儿子李某甲来骗取保险金，乙达到供养其情人张某乙的目的^[15]。

上述案例虽然只是个例，但是也能反映出，父母在为未成年投保死亡保险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李某为李某甲投保死亡保险时，李某甲才 10 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为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需要征求被保险人的同意才有效，但是为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保险合同也是有效

^[14] 参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分公司与王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 290 号）

^[15] 参见：父亲杀死亲生儿子诈骗保险金养情人，载：<http://www.365qilu.com/news/baike/13246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9 日。

的。因此，李某作为李某甲父亲，投保死亡保险时李某甲 10 岁，属于未成年人，不用经过李某甲同意就可以为其投保死亡保险。

【案例 3】2019 年 9 月 23 日 7 时许，海南省某县的公安局接到 65 岁的湖北男子杨某某报警称：其 37 岁的儿子杨某强在某县海边意外坠入海中死亡。经某县的公安局调查查明，杨某某儿子杨某强是智障人士，属于一个精神病人，在法律层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并非意外坠入海中，而是其父亲为了摆脱杨某强与别人合谋将其推入海中，并伪造意外坠入海中的现场^[16]。

上述案例中杨某强是一个精神病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年龄超过了 18 岁，已经属于成年人，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对于被保险人为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只有在被保险人允许为他投保的情况下才有效力。但是，在实务中，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往往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很难确认其同意权的行使是否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做出。另一方面，由于自理能力低下，对于家庭而言，他们永远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精神病人比智力正常的未成年人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要大一些。

【案例 4】1998 年 1 月张某水与张某某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张某刚（精神状况不健全），后因家庭矛盾而离婚，他们的儿子张某刚随张某水生活。2002 年 12 月，张某海与邻村的李某相亲，李某因张某海有孩子且有点傻而不愿意与其结婚。张某海非常的不高兴，偶然间得知人身意外险保费低，保障高，遂产生杀害儿子骗取保险金的想法。2008 年 3 月张某水从河北乘车到贵州为儿子张某刚买了 13 份保险。按照张某水的估计，如果他的儿子张某刚发生意外去世，他可以获得 38 万元的赔偿。2008 年 12 月 29 日，张某水趁其儿子张某刚睡着时将他推河沟里淹死。同年 10 月 29 日，张某水向保险公司索赔^[17]。

上述案例中张某刚精神状况不健全，死亡才 10 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除父母外，他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投保死亡保险。依照此规定，张某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亲张某水当然可以为他投保人身保险。显而易见，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精神状况不健全的人与不满 8 周岁的正常人相比发生道

^[16]参见：男子为骗保将智障儿子推入海中谎称意外坠海，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9 日。

^[17]参见：河北杀子骗保案，载：<http://news.sohu.com/news22644786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10 日。

德风险的概率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并没有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区分，显然是不合适的。

【案例 5】赵某乙（6 岁）学校统一为学生办理由保险人丙所承保的学生平安保险，保费为 1.5 万元，赵某乙父亲赵某甲为赵某乙交纳了保费，后赵某乙在保险期间意外死亡，赵某甲申请赔偿，保险人丙以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不得为 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为由拒绝赔偿。故而，赵某甲人民法院起诉保险人丙，要求保险人丙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赵某乙的保险金，后给付赵某乙学校 50000 元保险金，称不再负有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经人民法院两审终审，支持了赵某甲的诉讼请求^[18]。

上述案例中保险人丙明知保险由学校办理却依然承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又以父母以外的其他主体不得为 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保险为由拒绝赔偿。保险人丙是典型的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严重的背离了诚实信用原则，想利用我国《保险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来否定保险合同的效力，以达到规避自身义务的目的。这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保险人核保的内容不够丰富及核保责任弱化造成的^[19]。

^[18] 参见“陆惠清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再审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锡商 再提字第 00004 号）。

^[19] 参见邓晓珊《未成年人死亡险问题研究》，2017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第 19 页。

第四章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和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对投保以未成年人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死亡保险进行限制的四种主要模式的特点与缺陷，同时也对四种模式立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部分通过典型案例的形式讲述了我国未成年人保险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通过第二部分四种立法模式比较和第三部分我国保险实践中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未成年人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和 34 条，即我国从父母投保、设定最高额保险金和征求未成年人同意等三个方面来防范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道德危险的发生。结合我国未成年人保险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未成年人保险制度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4.1 投保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什么人可以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呢？我国《保险法》和高法院关于我国《保险法》适用问题的解释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1）除父母之外任何人不得为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2）父母可以为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但是保险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最高额；（3）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保险合同也是有效的；（4）其他具有监护责任的人经过未成年人父母同意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投保死亡保险；（5）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其他具有监护责任的人为他们的子女投保死亡保险不用征求他们的子女同意保险合同也是有效的。

相较之下，可以为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的范围就要大一些，关于可以为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的主体，我国《保险法》第 12 条和第 31 条¹通过保险利益的方式来确定投保死亡保险的主体，具体内容如下：（1）为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的主体必须具有保险利益；（2）以抚养、赡养、扶养关系或者劳动关系为纽带而具有保险利益；（3）保险利益可以通过被保险人同意投保而获得。

在保险实践中，有部分人有投保需求但是不具有投保资格，如本文第三部分【案例

1】中王某甲的爷爷王某，王某乙父母因交通事故去世后，生活由爷爷王某照料，王某有为其孙子王某乙投保的需求，通常情况下，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对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都是非常疼爱的，大多数甚至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疼爱，他们希望通过购买保险为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增添一份保障^[20]。因此，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伤害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骗取保险金的概率极低，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我国《保险法》只赋予了无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父母为其投保死亡保险的权利，显然投保主体过于狭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扩大投保人的范围，可以赋予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投保死亡保险的权利。

4.2 被保险人问题

4.2.1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意权行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权应由自己行使；另一种观点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权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我国《保险法》规定，父母为不满18岁的子女投保人身保险，不受被保险人同意的限制，使得在保险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代为签名”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我国《保险法》中关于“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规定形同虚设，条文合理性引起许多人讨论。我国《保险法》第34条的立法目的是尊重人格权和防范道德风险，否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行使“同意权”不仅侵犯了人格权，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通过本文第三部分【案例2】也可以看出，父母在为未成年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所处的“超然地位”所产生的隐患；另一方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两种，一种是：“年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另一种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在实务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大多数往往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很难确认其同意权的行使是否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做出。通过本文第三部分【案例3】可以看出，由于自理能力低下，对于家庭而言，他们永远是沉重的负担。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精神病人相比智力正常的未成年人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要大一些。

4.2.2 精神状况不健全的被保险人的投保问题

^[20]周丽：“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问题初探”，载《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8月第4期。

精神状态不健全的人是指因各种外界有害因素所导致大脑功能紊乱的人。具体表现为感知、思维、注意、记忆、情感、行为和意志智能以及意识等方面不同程度的障碍。对应我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可以把把精神状态不健全的人分为五类，一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二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三是智力与年龄不符的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四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五是智力年龄不符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只有父母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死亡保险，然而，什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国《民法典》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分为三类，一是年龄没有达到8周岁的未成年人，二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三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通过分析我国《保险法》第33条规定可以得出：第一，我国《保险法》不支持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死亡保险；第二，我国《保险法》并没有完全禁止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死亡保险。然而关于我国《保险法》第33条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包含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包括精神的精神病人；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智力因素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要被保险人是没有达到8周岁的未成年人就可以。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中只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了特殊规定，并没有专门条款对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作出特殊保护。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有交叉的部分，但是并不能完全涵盖与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还有一部分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由于生存能力和识别能力受限，在社会中的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被公正的对待。通过本文第三部分【案例4】可以看出，对于家庭而言，因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永远是累赘，相比正常人，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的权利遭遇侵害的可能性更大，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也更大。因此，对于不同道德风险的人群应作出区别对待，而不能一视同仁，如果不区别对待相当于变相的侵害了因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的权益。宋修卫认为：“被保险人只要是10周岁以下儿童即可，精神智力因素都不作考虑。”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中专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作了特别的限制，其目的是为了

是非常不合理的。笔者建议将未成年被保险人区分正常人与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分类投保。

4.3 对保险人核保责任缺乏适当的规制

核保是指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投保申请进行审查、核定和选择风险的过程。核保是保险承保的前提，是保险人处理业务的第一步，核保时保险人应该详细审查投保书的陈述、代理人或经纪人的意见、实地调查报告、与投保人有关的银行、信用公司和雇主提供的资料等。还需注意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对存在过分不良危险的，应当拒保，对高于一般的危险，应提高费率或向投保人提出改进建议，使其改进后承保。

超额保险问题在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中经常出现，我国保监会已有相关政策对此问题进行回应，我国保监会规定，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签订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前，有义务审查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已经超过规定的最高保险金额。如果保险人严格遵守该规定，认真的履行核保责任，那么能够非常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中经常出现的超额保险问题，对于防范道德危险也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中，影响道德危险发生的因素绝非只有超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有无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等都是影响道德危险发生的因素，都应该被全面地审查。

无责任之法律可谓无牙之老虎，法律责任是义务履行的保障，法律不仅要详细的规定需要履行的义务，更需要规定不履行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法律仅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需要履行的义务，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那么该规定的价值将只有道德的号召性，而没有法律的强制性。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保险人不履行核保责任需要受到什么惩罚，现如今只能通过我国《保险法》第 116 条第 13 项^[21]的兜底条款，对保险人不履行核保责任进行处罚。

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投保申请进行审查、核定，在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本文第三部分【案例 5】可以看出，由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保险人核保的内容不够丰富及核保责任弱化，保险人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怠于履行其核保义务，使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变大，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21] 《保险法》第 116 条第 13 项规定：“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第五章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道德危险防控模式还有待改进，下面将从投保主体范围、被保险人、保险人核保责任三个方面对我国未成年人保险制度提出建议：

5.1 投保主体范围适当扩张

高法院关于适用我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于201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在此之前，只有未成年人的父母可以为他们投保死亡保险，如果父母死亡，就没有可以为他们投保死亡保险^[22]。2015年高法院关于适用我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虽然此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投保人的范围，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的需求，例如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他们对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有着非常强烈的投保意愿，然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只有父母可以为他们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并不在可以投保范围之列。显然范围过窄，通常情况下，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对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都是非常疼爱的，大多数甚至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疼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伤害自己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骗取保险金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道德危险的发生的可能性也极小。在保险实践中，他们也希望通过购买保险为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增添一份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扩大投保人的范围，可以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投保死亡保险的权利。如此规定，一方面，可以填补父母双亡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没有人有资格为其投保的空白；另一方面，可以为有父母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增添一份保障。

5.2 被保险人相关规定的完善

5.2.1 被保险人的同意权专属

^[22] 参见梁鹏：《司法解释中的死亡保险问题》，载《上海保险》2016年第3期。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两种,一种是年龄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另一种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本小节只讨论年龄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在下一节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若被保险人是年龄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我国《保险法》第34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应当作缩小解释。同意权只能由被保险人自己行使,不能适用《民法典》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同意、追认的规定。理由如下: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理,《民法典》是一般法,《保险法》是特别法,因此,《保险法》中规定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应当排除《民法典》中规定的“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适用。另一方面,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障人格权和防范道德危险。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而人寿保险合同的对象又是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必须给与特别保护,应当把这里规定的同意行为和一般合同中的同意行为作区分。

民法典中涉及到人格权的婚姻、收养等制度,都禁止了法定代理人代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行使与其人身权相关的“同意权”,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尊重人格权,另一方面,对代理权滥用也起到一定的规制作用。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合同不仅涉及人格权,还有道德风险因素的存在。因此,为了保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将我国《保险法》中规定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限定只能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本人作出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保险实践中,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多数情况下是父母,这样一来投保人便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投保人,另一方面又是法定代理人。如果不排除《民法典》中规定的“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适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父母不仅拥有为他们签订死亡保险合同的权利,更可以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代替他们履行“同意”权。这样一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父母将不受制约,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也会如同摆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道德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也就失灵了^[23]。如果在保险金比较低的情况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父母在亲情的影响下谋害子女骗取保险金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在保险金比较高的情况下,发生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就比

^[23] 参见孔珊珊:《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法律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3期。

较大了。

综上所述，在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作为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同意权”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定，只允许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本人行使，不能代替，真正让“同意权”专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本人。在保险实践中，我们可以学习德国经验，德国完全把死亡保险的“同意权”专属被保险人本人，不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都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24]。但是，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都有能力行使“同意权”，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智力发展水平有限，对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还不能真正理解，赋予他们“同意权”也不能真正行使，只不过徒有其名罢了。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智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一定的识别能力，赋予他们“同意权”既合情有合理，我们可以对德国《保险合同法》进行改良，即分为法定代理人不是投保人和法定代理人是投保人有两种情形，当法定代理人不是投保人时，法定代理人必须在被保险人亲自书面同意之后再一次签名表示同意；当法定代理人是投保人时，只要作为被保险人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书面或口头表示同意后合同就发生效力。因此，具体到法条修改上，笔者建议把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3款修改为：“父母为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

5.2.2 未成年被保险人的分类投保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中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有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他们概念有交叉的部分。法律应当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我国保险法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区分，通过前文论述可以看出，不做任何区分将使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不利于保护特殊人群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未成年人保险区分正常人与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分类投保。具体如下：

（1）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对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区分正常人与精神不健全的人，不满八周岁精神不健全的人是指智力与年龄不符的不满八周岁未成年人。对于不满八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他们由于智力发展水平有限，对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还不能真正理解，赋予他们“同意权”也不能真正行使，只不过徒有其名罢了。相反，父母对其子女之爱出于天性，将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意权”交由

^[24]参见黎建飞：《保险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其父母代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不满八周岁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应该完全禁止投保死亡保险,即使父母代为“同意”也不行。理由是:不满八周岁的精神不健全精神病人相较不满八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更多的需要家庭照顾,家庭不仅需要支出生活费用,更需要支付治疗费用,相较不满八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不满八周岁的精神不健全精神病人更容易被家庭所抛弃。

(2)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对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应当区分正常人与精神不健全的人,对于八周岁以上的正常未成年人,他们智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为了充分尊重人格权,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保护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权益,赋予他们“同意权”既合情有合理,我们可以将法定代理人不是投保人和法定代理人是投保人有两种情形,当法定代理人不是投保人时,法定代理人必须在被保险人亲自书面同意之后再一次签名表示同意;当法定代理人是投保人时,只要作为被保险人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书面或口头表示同意后合同就发生效力。但是,对于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有两类人,一类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另一类是智力与年龄不符的人,这两类人都应该被完全禁止投保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具体原因同上。

(3) 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精神不健全的精神病人对应对应我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可以把精神状况不健全的人分为五类,①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③智力与年龄不符的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④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⑤智力年龄不符的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第②③⑤类在前文已经论述,下面将就第①④类进行论述。

第①④类属于精神不健全的成年人,他们较精神不健全未成年拖累家庭成员的时间更长,经济支出更多,影响更大,更容易被家庭所抛弃;另一方面,由于智力和能力受限,经常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也容易被社会抛弃。对于第①类精神不健全的人,我国《保险法》第33条第1款已经完全禁止对他们进行投保以死亡保险,笔者对此非常认同。

对于第④类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我国《民法典》把这部分人定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在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智力正常的未成年人相比神志

不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被保险人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要大一些。另一方面，在实务中，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常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很难确认其同意权是否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行使的。因此，笔者建议完全禁止对第④类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

5.3 进一步丰富保险人核保的内容并强化其责任

我国保监会关于对保险人核保责任人的规定能够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中经常出现的超额保险问题，有利于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但是影响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道德危险发生的因素绝非只有超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有无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等都是影响道德危险发生的因素，都应该被全面地审查。笔者认为，为了堵塞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漏洞，应当将影响道德危险发生的因素全部增加核保的范围之内，例如：投保人和受益人是否相同、投保人和被保险是否具有血缘关系、投保人是否在多家保险公司购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保险金总额与我国保监会规定的最高限额是否相近。另一方面，应当全面强化保险人的法律责任，明确保险人不按照我国保监会的规定如实、全面地审查核保内容的法律责任，突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不能靠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兜底条款来解决。

结 论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购买保险的意识在逐渐增强，保险保障的需要也是与日俱增。保险立法的改进是大家共同的期盼，具体到未成年死亡保险制度上，怎样才能很好的防控道德风险，同时又有利于未成年人保险又快又好的发展，是我国完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的最终目的。如果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道德危险防控不严密，不仅会危害到未成年人的生命，更会扰乱社会安宁与和谐。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立法模式、分析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案例，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针对发现的问题，笔者提出：扩大投保主体范围、被保险人的同意权专属化、未成年被保险人的分类投保和进一步丰富保险人核保的内容并强化其责任等完善建议，希望对我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专著

- [1] 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2] 梁鹏：《未成年人保险道德危险之控制》，谢宪主编《保险法评论》。
- [3]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85 页。
- [4] 梁鹏：《评论与反思——发现保险法的精神》，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1 版。
- [5] 崔吉子、黄平：《韩国商法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76 页。
- [6] 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和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版。
- [7] 黎建飞：《保险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9 页。
- [8] 韩长印、韩永强编著：《保险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版，第 41 页。
- [9] 傅廷中著：《保险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 [10] 邢嘉栋著：《典型保险案例裁判思路与实务操作——一线法官以案说法》，法律出版社 2015。
- [11] 许崇苗著：《保险法原理及疑难案例解析》，法律出版社，2007 版。
- [12] 江朝国著：《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版。
- [13] 覃有土、樊启荣著：《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版。
- [14] 樊启荣著：《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版。
- [15] 曹兴权著：《保险法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版。
- [16] 桂裕著：《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 年。

（2）学位论文

- [1] 韩林：《浅析未成年人投保的法律漏洞》，载《中国保险》2011 年 6 月刊。
- [2] 达丽娜：《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浅析》，载《中国保险》2011 年第 1 期。
- [3] 马晨明：《未成年人保额限制政策破冰》，载《金融时报》2011 年 3 月 16 日第一版。
- [4] 张遥、刘渝：《关于我国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几点思考》，载《中国保险》2009 年 2 月刊。
- [5] 彭爱美、钟礼松：《为未成年人投保的法律问题探析》，载《中国保险》2007 年 6 月刊。

- [6]周丽：《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问题初探》，载《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8月第4期。
- [7]周厚武：《中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问题与解决》，《经济师》，2013年第7期。
- [8]杜颖：《保险中的道德危险及其消解》，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 [9]骆大朝：《死亡保险合同道德危险问题研究》，2006年5月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 [10]梁鹏：《探究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制度》，载《中国保险报》2011年3月28日第5版。
- [11]毛向东：“死亡保险的道德危险及其法律规制”，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9月刊。
- [13]侯志勤：“谁能为未成年人投保”，载《中国保险报》2004年6月23日第7版。
- [14]胡滨、曹顺明：“未成年人死亡险亟待法规完善”，载《中国保险报》2004年8月24日第2版。
- [15]邓晓珊《未成年人死亡险问题研究》，2017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 [16]孔珊珊：《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未成年人保险法律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3期。

[17]梁鹏：《司法解释中的死亡保险问题》，载《上海保险》2016年第3期。

（3）其他

- [1] <http://www.365qilu.com/news/baike/132464.html>。
-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3] <http://news.sohu.com/news220897569.shtml>。
- [4]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290号判决书。
- [5]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商再提字第00004号判决书。

致 谢

三年的研究生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回想在河南师范大学学习的三年，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在此我想由衷的感谢我的母校、父母、朋友还有亲爱的同学们。感谢我的母校河南师范大学给了我在法学院的三年进修学习的机会，让我能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李佳勋老师。从最初的定题，到资料收集，到写作、修改，到论文定稿，她给了我耐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老师渊博的学识，业谨的治学态度也令我十分敬佩，是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榜样，她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同时，感谢所有任课老师和所有同学在这三年来给自己的指导和帮助，正是由于他们，我才能在各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在此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并祝所有的老师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还要再次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这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同学，他们在我无助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让我在成长的路上不是孤身一人，与他们同行我无比的快乐和自豪！

写作毕业论文是一次再系统学习的过程，毕业论文的完成，同样也意味着新的学习生活的开始。由于时间的仓促及自身专业水平的不足，整篇论文肯定存在尚未发现的缺点和错误。恳请阅读此篇论文的老师、同学，多予指正，不胜感激！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

罗振中

2022 年 3 月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_____日期：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_____导师签名：_____日期：_____